

# 鄒衍生卒年世商榷

王夢鷗

## 引起誤會的記載

司馬遷寫孟軻荀卿列傳，緊接在孟子之下敍述鄒衍的學說及其受到諸侯「尊禮」的情形，然後又用與孟子生平困阨情形相比較，而謂孟子能方不能圓。這些語意很含蓄，到了桓寬手裡才給直說出來，而謂『鄒衍以儒術干世主不用，卽以變化終始之論，卒以顯名；孟軻守舊術，不知世務，故困於齊梁。』（鹽鐵論論儒）這顯然是說孟子沒有鄒衍那樣會投機，所以倒霉了一輩子。看這文章的結構，在孟子列傳後面接敍鄒衍，却像是故意提出鄒衍來作個對照，目的並不在乎替鄒衍寫傳記。然而影響國人精神至深且巨的陰陽五行說的宗師鄒衍（借用梁啓超「陰陽五行說之來歷」的結論），却從這篇孟荀列傳的夾縫中給後人以一瞥的機緣。依司馬遷的記載，鄒衍立說，「必先驗小物，推而大之」，這好像是一種求實證的類推方法。同時又說他早就意識到中國以外還有龐大的國土與人民。儘管那只是個大膽臆測，但以今觀之，當諸子爭鳴之世，算得上稍具自然科學興趣的人，好像就只有他了。再看司馬遷記述鄒衍當時得意的情形：『驪子重于齊，適梁，梁惠王郊迎，執賓主之禮；適趙，平原君側行敝席；如燕，昭王擁彗先驅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，築碣石宮，身親往師之。』的確，現代第一流的原子科學家周遊列國，也未必能得到如此尊禮，而鄒衍在二千多年前却已身受之了。這可證明當時的「有國者」亦頗具鄒衍一樣的興趣，照理，我國人對於自然界的知識就該從那時起飛而一直發展下來。然而事實適得其反，我們從先秦的記載裡，只看到戰國策記有「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，鄒衍自齊往」（燕策一）；以及韓非說「鄒衍之事燕，無功而國道絕」（飾邪）二條；其餘則是方士傳言：「鄒子在燕，其游諸侯畏之，皆郊迎擁篲。」（文選四十蔣公奏記及四十五解嘲注引七略）。我們還懷疑那些方士，已是漢世的方士。他們能把國家大典用的郊祀歌稱為「鄒子樂」（漢書禮樂志）當然對其宗師的捧場無所不至，而郊迎擁篲的傳說也就這樣地被張揚起來了。如果這些傳說並非捕風捉影之談，更會使人納罕，為什麼像鄒衍那樣

煊赫一世的人物而諸子傳說中竟極少提到？荀子非難「五行」却指是子思孟子的造說（非十二子），呂氏春秋抄寫五行說亦不題鄒衍之名，（有始覽應同），一直要待司馬遷在孟荀列傳的夾縫裡嵌入一段鄒衍傳記，才帶給後人一點印象。換言之，我們認為：如果方士的傳言和司馬遷的記述還具有若干真實性，像鄒衍那樣走紅的人物忽然變得落漠無聞，其中必有「非常」的原因；而且還可能是最早使人失去探求自然知識的興趣之主要原因。因此，就鄒衍的生平年世作一度檢查，並不是沒有意義的。

不過，關於鄒衍生平事迹，流傳下來的材料既是這樣稀少，而懂得他最多的司馬遷，對他生存的年世也說得十分含糊：在孟荀列傳中說他是後于孟子，後于鄒忌而先于鄒奭，會見過梁惠王，平原君，又為燕昭王師……這些雖比他在史記歷書中說鄒衍是戰國時人，在封禪書中說鄒衍是齊威宣時人，已具體得多；但，稽以史記六國年表，梁惠王之死至趙勝得到「平原君」的封號，其間相距將近四十年；他既受梁惠王的郊迎，又見到平原君的側行轎席，以常識判斷，他非活一百歲不可。據說他傳世有「重道延命方」（漢書楚元王傳附），就算他極會養生，但是要他活到燕惠王時代，就得一百歲出頭了。關於這種年齡問題，過去的考據家都沒有注意，到了現代，首由胡適提出質疑（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），其次是錢穆更詳細的作了考辨。錢氏在「先秦諸子繫年」（香港大學刊本）第一四四第一五二兩章，都有肯定的斷案，大意是誰前世載籍所記鄒衍的年世全錯了，因而不承認鄒衍與燕昭王的關係，並以為鄒衍自齊使趙，已在齊王建八年前後；所以他在諸子繫年通表上，把鄒衍的年世列自西紀前三〇五至二四〇年，享壽約六十四歲。這種年齡，依常識判斷，是大可接受的；但他抹煞了一切舊記載，而在二千多年之下要使鄒衍出生于齊宣王的晚年，活到秦始皇稱帝以後，我們認為這考辨須要先加以考辨。

第一，錢氏寫的那篇「鄒衍攷」，斷案雖很肯定，但在寫的時候却顯得很匆忙，因此不免忙中有錯。他說：『漢志道家有鄒子四十九篇，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。』按：漢書藝文志之道家不列鄒子，而鄒子的兩種著作都列在「陰陽家」中，司馬談六家指要已把「道家」「陰陽家」區別得很清楚，而漢書藝文志也區別得很清楚，但因錢氏把漢志的敍錄讀錯了，以致張冠李戴，使陰陽家變成道家。其次，錢氏在同篇中又引韓非子亡徵篇：說『鄒衍事燕，無功而國道絕』，其實此文不出於亡徵篇（第十五）而是在亡徵篇之後的飾邪篇（第十九）。韓非把候星望氣之術與鑿龜數筭之術混為一談，已是政論家不懂

數術的種別，而錢氏却把他的篇目也弄錯了。第三，更重要的一點：錢氏認定鄒衍死于秦始皇稱帝以後之最大理由，是爲着鄒衍遇趙見平原君的時候是在秦圍邯鄲，信陵君救趙之後。他的證據是史記平原君列傳之末一段記載。但我們却認爲那一段記載並不可靠，現在把它錄下：

史記卷七十六……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。公孫龍聞之，夜駕見平原君曰……君必勿聽也。平原君遂不聽虞卿。〔平原君以趙孝王十五年卒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〕平原君厚待公孫龍，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辨。及鄒衍遇趙，言至道，乃紺公孫龍。

錢氏引據此文，忽略去了括符中「平原君以趙孝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」二十字，大是斷章取證；而誤解亦由是而生。據我們所看到司馬遷寫的許多列傳，最多數的結構都是從其人生平敍至死後，子孫或世其家或失官或奪爵爲止，正像此傳所說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」一樣。因此我們認爲這二十字已是平原君傳記的結束（這種結構形式，不特史記諸傳文具在，可以複案；而且還被後人舉爲碑版傳文的法則，（如黃宗羲「金石要例」所訂者）。本傳結束以後另加補敍語，雖然史記中亦有其例，如吳王濞，主父偃列傳等，但顯然的，那些補敍之事都是獨立的，也正像此處補敍「平原君厚待公孫龍……」云云，沒有理由可與「虞卿請封」之事相連綴。並且，倘以賈誼、酈商、田叔、衛霍等列傳之末爲後人附益的例子來比照，甚至可疑這最後數語還不是司馬遷的補敍語而是後人的附益語。質言之，我們認爲根據這段補敍語，不能證明鄒衍遇趙之時必在邯鄲解圍以後。第四，再以鄒奭的年世稽之；司馬遷說齊有三鄒子，先鄒忌，後鄒奭，其敍次已明；且又曰『鄒奭亦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』，則更顯示鄒衍鄒奭年世的先後了。如果依錢氏的安排，使鄒衍活到秦始皇稱帝後之第四年，則『頗采其術以紀文』的鄒奭就該與張蒼叔孫通等人同年輩了。那時自秦至漢，首尾不過三十多年，我們既不見那個「雕龍奭」活躍于秦漢之際，倒可斷定他是「墓木已拱」了。事實上，鄒奭的年世必須往前推算，因之，鄒衍不特沒有理由能活到秦始皇時代，甚且不能活到秦圍邯鄲的時候。錢氏過份博涉，引證不免粗濫，故其在「鄒衍攷」所作：『今按鄒衍至趙見平原君，在信陵破秦存趙之後，事見平原君列傳。時梁惠王死已七十二年，燕昭王亦死二十二年矣。衍不及見燕昭齊宣，遑論齊威梁惠

乎？」這個斷案，毫無可取，我們不得不回頭來檢視那些被認為全是錯誤的記載。

## 鄒衍在燕昭王時的作爲

鄒衍與燕昭王的關係，其事早載於戰國策燕策一，史記燕世家，韓詩外傳卷七，新書卷十，大戴記第四十八，新序卷三，說苑卷一卷八。雖然那裡面有些是轉相抄錄（例如新書與大戴記），但它僅有「齊湣王」與「齊閔王」的寫法之差異，此外則異口同聲都說是燕昭王招賢者，鄒衍由齊赴燕；而戰國策與新序所記的尤其詳細。這些可能都是西漢人看到的記載，到了東漢，最講究文章之真實性的王充，他對這些記載，不特不生疑問，而且還屢加引述。

論衡別通篇：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，心自通明，覽達古今，故其見通人也如見大賓。燕昭爲鄒衍擁躉，彼獨受何性哉！又超奇篇：會稽周長生者，文士之雄也。使遭前世燕昭，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。

自此以下，鄒衍之爲「燕昭王師」的身份差不多已確定了，而爲註解家文章家所常指稱。如果這點事實可得決定，則我們雖沒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說明鄒衍的生平年世，但借燕昭王的事迹却可間接證知鄒衍的年世。燕昭王生平有兩件大事，一是卑身厚幣，招請各國的賢者；二是聯合六國之師打垮萬乘的齊國。司馬遷編的六國年表，中間亦偶有錯誤，但是關於燕昭王之第二大事，亦即六國伐齊的時間，他在秦本紀、魏、韓、趙、楚、燕，田敬仲諸世家所記載的，與六國年表登記的，分毫不差。那時是周赧王三十一年，約當西紀前二八四年（此據六國表推算）。此事距離燕昭王即位的時候已二十八年，我們相信他的第一件大事，必定發生在即位不久之後。不過，他在即位後第幾年遇見郭隗而決定大規模招納賢者？鄒衍又在他的決定招納賢者之後第幾年才到燕國？這疑問，雖然史無明文解答，但我們仍可取得一些旁證，那就是樂毅赴燕之年。樂毅赴燕之年，史記隱約有所說明。

史記卷八十：樂毅委質爲臣，燕昭王以爲亞卿，久之。當是時，齊湣王南敗楚相唐昧于重邱，西摧三晉于觀津，助越滅中山，破宋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。

據田敬仲世家云齊湣王二十二年，敗楚將唐昧于重丘；但六國表及楚世家則皆云二十三年，據今人所訂戰國年表當爲湣王二年（約當西紀前三〇〇年）。又據蘇代云：『齊湣王長主也，南攻楚五年，積畜散；西困秦三年，土罷敝；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，而包十二諸侯。』（戰國燕策同）田敬仲世家云湣王三十八年伐宋（依戰國表當是十八年，約當西紀前二八六年）；是則，自敗楚至伐宋，其間一十五年，即司馬遷所謂樂毅在燕之「久之」。西紀前三〇〇年是燕昭王即位後之十一年，樂毅赴燕，當在此時前後。現在，我們雖不能定鄒衍赴燕更在樂毅之後或前，但我們認爲燕昭王願以「高位」寵錫外來的客卿，大抵總在剛始招賢，燕國還很「小弱」的時候，所以樂毅能做到亞卿，而只會談天的鄒衍竟還取得「師」的尊位。燕昭王曾經對郭隗說：『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；孤極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報。然誠得賢士以共國，以雪先王之恥；孤之願也。先生視可者，得身事之。』（戰國策史記同）這顯然是爲着志切報仇，所以求賢若渴，凡先到者必得高官，鄒衍之能爲「師」，宜其來時不落樂毅之後，抑且必在公孫龍之前。呂氏春秋記公孫龍對燕昭王說：『日者，大王欲破齊，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，大王盡養之；知齊之險阻要塞，君臣之際者，大王盡養之。』（應言篇）因爲他說這話時，燕昭王已經招納得很多很多游士了。若使鄒衍在樂毅之前到燕，則至多不過是燕昭王即位後十二三年間。那時燕國在敗亂之後，局處北方，天寒地瘠；他要復仇，首須謀求富國強兵。我們平省舊記載，可知樂毅之爲亞卿，是在「強兵」方面有所貢獻；至於「富國」方面，則可能是鄒衍會給與助力。這裡有一種極受王充攻擊的傳說，那就是「鄒衍吹律，寒谷復溫」的故事（論衡變動篇）。今此故事，太平御覽卷十六，五十四，八四二數引其文：

御覽八四二引劉向別錄云：傳言：鄒衍在燕，有谷地美而寒，不生五穀。鄒子居之，吹律而溫至，生黍到今，名黍谷焉。  
○（文選卷四十阮籍奏記討引略同）

這個劉向別錄所據之「傳言」，我們有理由相信是出自古淮南子書中的記載（說見下文），應爲先秦流傳至漢的記述（是否出自方士則未可知，列子湯間且引爲典據）。東漢王充看到此事，認是不可信的神話。其實，依劉向別錄所謂「鄒子居之，吹律而溫，生黍到今」云云，其中毫無神話性。因爲鄒衍本是陰陽家，班固謂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（漢書藝文志），司馬談說

他們能「序四時之大順」（史記自序），換以今言，陰陽家除去原始巫術的成份，他們本是天文氣象學者。那時，測定星曆還沒有精巧的儀器，他們只靠「葭管吹灰」的方法。這方法，後漢書律歷志裡即有詳細的記載，晚至宋人沈括更為之作一次考證（夢溪筆談卷七）。這叫做「吹律」，實在毫無神秘之處。呂氏春秋云：『天生時，地生財。不知事者，時未至而逆之，時既往而慕之，當時而薄之；種稑禾不爲稑，種重禾不爲重，是以栗少而失功。』（任地篇）可見到了戰國時代，有些地方在農事上仍不知土壤氣候與農作物之適當配合利用。因此寫書的人仍須強調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」的帝功。燕國氣候寒冷，與黃河流域諸侯國的緯度不同，農作的季候亦宜稍異。據蘇秦說燕文侯曰：『燕民雖不田作，粢粟之實足食，此所謂天府也。』（戰國策燕策）是又可知燕國本不生五穀，到了鄒衍至燕，用吹律的方法，測定當地節候引進黍種，教民田作（如今東北之「青紗帳」豈非由他而起？）這叫作「吹律而溫至生黍至今」。凡是略具「神話學」常識的人，都懂得許多事實爲着傳述者的「語言疾病」而變成成神話的道理。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王充之痛詆這個傳說，實由於他自己的語言疾病；他把淮南子的記載說成「鄒衍吹律，寒谷復溫」，這就彷彿是那個「律」把那個「谷」直接吹「溫」了似的；因而也就像個神話了。

如果這條記載，可補信史之闕，則我們相信燕昭王爲鄒衍築碣石宮，身親往師之，而鄒衍也能處之泰然，受之無愧之所，以然之故了。鄒衍爲師的資格既經確定，我們還要稍進而推測他當時的年齡。司馬遷說他是先「重于齊」而最後始「如燕」。縱使那段記載中「梁惠王」之「惠」字或是誤記（史記魏世家所記與此同），但我們相信那裡所記鄒衍遜歷的次第，大體是無誤的。他之見重于齊，得到「談天」的頴號，或即在那時。然而他能够談天，必然先經過一段時間的「深觀陰陽消息」，換言之，他必須在候星望氣，天文氣象方面下過一番研究工夫，然後才能「談」。而且當時稷下之士，不乏賢者，對他所談的天，能無所批「駁」，而心誠悅服，也不是一年半載之事。換言之，鄒衍的氣象歷算知識能見重于當時，似亦曾經一段「辯」過來的工夫。就像荀子的天論，儘管菲薄「大天而思之」的思想，但對於「天」的實際知識却無力反駁；屈原的天問，儘管對那些神話問個不休，但對於天的實際知識，也似毫無意見。我們以爲這點「才能」與「名譽」的建立，至少要費三

十年的時間，加上「少不更事」的一段童年，則鄒衍之重于齊，其時也該有三四十歲了。若使他已過了「強仕」之年，到達燕國，在那新王面前，做個老師，似乎更為得體。總而言之，鄒衍赴燕，約在西紀前三〇〇年之後，那時他該有四十多歲了。

## 鄒衍去齊的時代

鄒衍既重于齊，為什麼又跑到燕國去幫助燕昭王反攻齊國？我們認為那不是僅僅有感于燕昭王之能「卑身」或貪他的「厚幣」，其重要的原因當出於齊國國內的環境變樣，當時稷下的空氣已不能使那些智識份子生活下去。此事，桓寬有一段記述，

鹽鐵論第十一：齊（威）宣之時，顯賢進士，國家富強，威行敵國。及湣王，奮二世之餘烈，南舉楚淮，北併巨宋，包十二國，西摧三晉，却強秦，五國賓從，鄒魯之君，泗上諸侯皆入臣。矜功不休，百姓不堪，諸儒諫不從，各分散。○慎到捷子亡去，田駢如薛，而孫卿適楚。

他在此處所列「稷下」散去的游士名單中未包括鄒衍的原因，可能是為着下文要單獨提出，而謂「鄒子以儒術干世主，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，卒以顯名」云云。我們據方士傳言：鄒衍之顯名于諸侯，實際是在他為「燕昭王師」的時候；史記孟荀列傳亦載他在那時「作主運」，與桓寬之說合。然則所謂「千世主不用」云者，當是在齊的時候了。但齊宣王好文學之士，列大夫七十有六人，自不能說他不用鄒衍；然則，他在齊之不見用，當然是指那繼位的湣王了。蘇代說齊湣王是個「長主而自用，驕而好利」（蘇秦列傳），呂氏春秋批評湣王的失敗，亦正由于此。

呂氏春秋卷二十行論：齊攻宋，燕王使張魁將兵以從焉，齊王殺之。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，請令舉兵以攻齊。凡繇爭之曰：『松下亂，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，王苦痛之，而事齊者，力不足也。今魁死而王攻齊，是視魁而賢于先君。』王曰：『然則如何？』對曰：『請王縞素辟舍于郊，遣使于齊，客而謝曰：此盡寡人之罪也！大王賢主，而燕之使者

獨死，此敝邑之擇人不謹，願得變更請罪。』使者行至齊，齊王方大飲，左右官實御者甚衆，因令使者進報，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。畢，又復之，以矜左右官實。此濟上之所以敗，齊國以虛也。（以上節錄）。

又卷十五權勳篇：昌國君（樂毅）將五國之兵以攻齊，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于濟上。齊王耻而訾之，觸子苦之，欲齊軍之敗，卒北。達子又帥其餘卒，以軍于秦周，無以賞，使人請金於齊王，王怒曰：若殘堅子之類，惡能給若金。與燕人戰，大敗，達子死，齊王走莒。（以上節錄）。

齊湣王驕而好利的癖氣，好像至死不悟。司馬遷記述云：『樂毅入臨淄，湣王出亡，之衛，衛君辟宮舍之，稱臣而共具，湣王不遜，衛人侵之，湣王去，走鄒魯，有驕邑，鄒魯之君弗內，遂走莒』（田敬仲世家）。他經過鄒魯的情形，似乎魯仲連在當時知道得更清楚。

史記卷八十二：魯仲連曰：齊湣王將之魯，夷維子爲執策而從，謂魯人曰：子安取禮而來吾君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諸侯辟舍，納筦籥，攝衽抱枕，視膳於堂下。天子已食，乃退而聽朝也。魯人投其籥，不果納。將之薛，假途於鄒。是時，鄒君死，湣王欲入弔，夷維子謂鄒之孤曰：天子弔，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于南方，然後天子南面弔也。鄒之羣臣曰：必若此，吾將伏劍而死，固不敢納。

有其主乃有其奴，當時齊湣王身邊全剩夷維子一類的奴才，所以呂氏春秋評之曰：『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，此公玉丹所以見信，而淳齒所以見任也。』（正名篇）。而公玉丹淳齒的故事，也載在同書審己篇及新序，戰國策等書。

新序卷五：齊閼王亡居衛，晝日步走，謂公玉丹曰：我已亡矣，而不知其故。吾所以亡者何哉？公玉丹對曰：臣以爲王已知之矣；王故尙未知之邪？王所以亡者，以賢也！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！因相與合兵而攻王，此王之所以亡也。閼王慨然太息曰：賢固若是其苦邪！

戰國燕策六：閼王奔莒，淳齒教之曰：天雨血，地坼至泉，人有當闕而哭者，天地人皆以告矣，而王不知戒焉，何得無誅焉。于是，殺閼王子鼓里。（節錄）

先秦傳說，對於齊湣王幾乎沒有一句褒辭，這正顯示他當時得罪了所有的知識份子。證以蘇代告訴秦昭王的話說『中國白頭遊敖之士，伏軾結軼西馳者，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』（田敬仲世家），便可看出當時的游士離開稷下的情形。呂氏春秋云：『亡國之主必自驕，必自智，必輕物。自驕必簡士，自智則專獨，輕物則無備。』（驕恣篇），這無異于替齊湣王寫照。我們前引「鹽鐵論」說齊湣王時「慎到捷子亡去」；按說文云；『亡，逃也』；國語楚語云：『子弔有罪而亡』，古書凡用「亡」字多屬此義。韓非孤憤篇說當時「法術之士」，遇及暴君，其可以罪過誣者，則以公法誅之；其不可以罪過者，則以飛劍窮之。我們懷疑慎到捷子之所以「亡」，正因此故。但稽以史記，齊湣王時，猶不僅稷下的先生們畏罪逃亡，連大名鼎鼎的孟嘗君也是這樣。

史記卷七十五：齊湣王滅宋，益驕，欲去孟嘗君。孟嘗君恐，乃如魏。魏王以爲相，西合秦趙與燕共伐破齊。我們懷疑鄒衍之離齊的原因或與慎到捷子以及孟嘗君一樣，都是由於無法自安於國內，因而適魏，適趙；又聽到燕昭王正在延攬人才，最後乃到了燕國。而且他在燕國的作爲，大概也和孟嘗君一樣，身爲齊人却倚外國的力量來攻打齊國。當時燕昭王倘不早死，而齊國沒有那個遠房的本家田單，還怕燕爲北帝，趙爲中帝，秦爲西帝的局面已定着了。

司馬遷說鄒衍有一套理論，叫做「終始大聖」之篇，又說他在燕國作「主運」。據魏如淳的注解，說主運篇講的是「五行相次轉用事，隨方面爲服」。錢穆氏會着眼在「隨方面爲服」一語，認爲「主運」是屬於明堂月令一類的文章（古史辨五批評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）。我們讀莊子天運，禮記禮運，覺得凡名爲「運」的，多少都帶有說明堂月令的用意。但這「主運」是否也是這樣，就不敢妄斷。不過，我們讀司馬遷序「秦楚之際月表」，確信他所指的「大聖」乃是「受命而帝」之帝。

史記卷十六：太史公曰：初作難，發於陳涉。虐戾滅秦，自項羽。撥亂除暴，平定海內，卒踐帝祚，成于漢家。然王迹之興，起於閭巷，安在無土不王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？豈非天哉！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？（節錄）

他說「受命而帝」本來有「傳書」，而那本傳書，他在秦始皇本紀和封禪書中都會提到。尤其封禪書還摘述一點關於五德終

始傳的內容，而那內容，司馬貞索隱說是出自呂氏春秋。誠然，呂氏春秋所記的雖有些微出入，但較史記所引者爲詳。

呂氏春秋卷十三應同篇：凡帝王之將興也，必先見祥乎下民。黃帝之時，天先見大螢大蝶，黃帝曰土氣勝。故其色尙黃，其事則土。及禹之時，天先見草木，秋冬不殺，禹曰木氣勝。故其色尙青，其事則木。及湯之時，天先見金刃生于水（史記作「銀自山溢」），湯曰金氣勝。故其色尙白，其事則金。及文王之時，天先見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，文王曰火氣勝。故其色尙赤，其事則火。代火者必爲水，天且見水氣勝。水氣至，而不知數備，將徙于土。

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五德終始論，因爲它的種類太多了，連司馬遷當時都闡不清。既說這是鶻衍作的（孟荀列傳），又說這是「鄒子之徒」作的（封禪書），又說「五德終始之傳，古文咸不同乖異」（三代世表序），當然二千多年後的我們更闡不清了；這裡但能以「理」推之。我們認爲不論是鄒衍抑或鄒子之徒，但那些乖異而不同的「終始」，必屬於後者的作品。因爲倘爲鄒衍一人所作，必不至於乖異若茲。換言之，五德終始之傳，本來只有一種；而那一種，後依來多數註解家的意見，都以爲說「夏木殷金周火」那一套的是鄒衍的創說。我們也以此相信呂氏春秋的記載，當爲鄒衍的遺文。鄒衍是著名的陰陽五行家，他對於五行方位的配列，流傳至今者，幸而只有一說，那就是東方木，南方火，西方金，而北方水。因此我們懷疑鄒衍當時撇下五行相生的原則，而改用「五行相勝」的原則來推論終始大聖，其目的就是要排列出一個「水德之王」來接代火德之周王，以令諸侯而安天下。燕國在北方，適當「水」位；燕昭王時是否「天已見水氣」？因史無明文，我們無從答覆；但讀蘇代遺燕昭王書稱三帝，而燕昭王善之，則可參悟其一二。

史記卷六十九：蘇代遺燕昭王書曰：秦爲西帝，燕爲北帝，趙爲中帝，立三帝以令于天下。燕昭王善其書，乃召蘇代，復善待之。（戰國策文同，此乃節錄）

三帝之中，倘據鄒衍的推算，只有北帝更接近于受命之符，中間或尙欠水德之瑞，或已有此瑞，而燕昭王仍謙遜未遑，故曰「水氣至而不知數備，將徙于土」。我們認爲這句很像激勵勸進的話。其時趙國未經長平之敗，正當兵強馬壯的時候，樂毅說燕昭王欲伐齊，必先與趙國相結約，亦是此意。倘以此意推之，則燕昭王倘不稱帝，而那五德將移與「土」，土是中帝，也是趙國了。

雖然，我們這點推理之言，未足據信；但有一點：那就是鄒衍在燕還不僅吹律而教燕人種黍，並且還排列了一套足以激發燕昭王和士氣民心的五帝德，這樣也就不愧做個「王者師」了。我們相信這點鼓舞作用，使弱小的燕國，終于能摧毀萬乘的齊國，而奪得他們八百歲的積蓄（這是樂毅說的）。那時鄒衍在燕已十餘年，大約是六十多歲的「白頭游敖」之士了。

## 鄒衍之結局

關於鄒衍之死的年代，我們認為司馬遷在孟荀列傳裡本有籠統的記載，但爲着他的著作經過太多的讀者編者補續者添注者之手，再經轉抄流傳，反而顯有許多支離破碎紊亂難解之處。例如孟荀列傳，說到荀卿一段，其中即顯有許多添註語被抄成正文，茲錄之如下：

史記卷七十四：荀卿，趙人；年五十，始來遊學於齊。騶衍（之術迂大而闕辯）奭（也文具難施）淳于髡（久與處，時有善言。故齊人頌曰：談天衍，雕龍奭，炙穀髡）田駢之屬皆已死，齊襄王時，荀卿最爲老師。

我們認爲司馬遷的這段文字，本來只寫道：『荀卿，趙人，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。騶衍，奭；淳于髡，田駢之屬皆已死，齊襄王時，荀卿最爲老師。』其餘括弧中的文字，本都是後人的添記語：如曰「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，奭也文具難施；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善言。故齊人頌曰談天衍，雕龍奭，炙穀髡」。顯然這三節添記語本相連貫而自成段落，但傳抄者把它分別闡入正文，又將人名合併爲一，乃成今狀。儘管是司馬遷發憤著書，他的筆法亦跌宕不凡，但在此處說的一段平白的話，決不至纏夾如此；只有不通文理的抄胥，才會這樣割斷文脈，不顧語意而亂寫一陣。就文理說來；第一，說荀卿遊學於齊，忽接上不相干的騶衍等人的評語，這已够奇怪了。下面說到炙穀過髡，忽又接上不相干的田駢之屬皆已死。如果不是「醉墨」，何來此種文法？第二，「騶衍」之下，本不須添入「之術迂大而闕辯」，因爲司馬遷在上文敍述騶衍著作時，已說他「作怪迂之變」「其語闕大不經」了，沒有理由又在這裡插入這麼一句。第三，說到鄒奭，司馬遷亦已在上文說鄒衍的著作「王公大人初見其術，懼然顧化，其後不能行之」又說「鄒奭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」，本就是這裡「文具難施」的意思，也不須在這裡重出。

第四，關於淳于髡以下的話，純然是節錄另一傳說，可能是上文講到淳于髡之事一段的結語而錯簡在此。第五，若騶衍，庾淳于髡之下皆有所附述，則田駢之下不容沒有附語。因爲關於「天口駢」的軼事亦並不少，此處何以獨無？凡此種種，該說的未說，不該說的又重說了許多，而且文氣間斷，語意上下不接，這都不像大文豪故弄的玄虛。至於再就全篇看來：孟荀列傳末段云：「自如孟子至于吁子，世多有其書，故不論。其傳云：蓋墨翟宋之大夫，善守禦爲節用，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」，這裡自『其傳云……』以下文義與上文不相干，顯是別處湊合的零策。其次又如：稱淳于髡爲「炙穀過髡」，清人已解明其原文本以「穀」借爲「裸」，讀者復以「過」字標音以免誤會爲「穀」之本字，後來抄胥並錄之，乃成「穀過」；則又可見這一段文字，本有錯簡以及旁注錄成正文的痕跡。儘管這種錯誤其來已久（裴駟所見即已如此），但衡以文理與事實，仍不難加以矯正。倘據矯正後的這一段文章讀來，不僅可知鄒衍、田駢之屬，到了齊襄王時皆已死去；而且可知：正爲着那些前輩之死，所以下文乃說荀卿最爲「老師」。

我們認爲鄒衍死于齊襄王時代，還有一條旁證。雖然這旁證僅是「鄒衍吹律」一類的傳說，但錢穆氏嘗據此以爲鄒衍不及見燕昭王，僅及見燕惠王，所以他要活到秦始皇時代的另一理由。這條傳說，錢氏僅採太平御覽所引淮南子之文：

御覽卷十四：淮南子曰：鄒衍事燕惠王盡忠，左右譖之王，王繫之獄，仰天哭，夏五月，天爲之下霜。

其實淮南子的這條佚文，並見于初學記卷二「燕繫鄒衍」句及北堂書鈔卷一五二「夏霜」下。而書鈔把「盡忠」二字寫作「盡誠」。據孔廣陶校記謂：改「忠」字爲「誠」，是因虞世南避隋文帝父親楊忠的諱。這話是否可信，並不妨事；因爲這條傳說，在東漢時即大爲王充所不滿，而他在論衡之感虛，寒溫，變動等篇中一再提出，力斥此說爲虛妄。王充引述此事，不說是出自「淮南子」而但稱「傳書言」（感虛篇），因此我們相信王充所稱「傳書」「傳語」「傳曰」等等，那種「傳」，有的就是「淮南子」。雖然王充除了「君人」可以感天之外，絕不相信凡人可以感天，故對於「鄒衍匹夫，一人感氣，世又然之」（寒溫篇）的態度抱着極大的反感。然而，我們雖不信「感天」之說，但也不能抹煞世上有「偶合」之事。鄒衍被囚，五月降霜，是一偶合的機會而爲方士們所宣揚，這是可能之一。再者，據司馬遷所知道的，六國之世，「史不記時，君不

告朔，疇人子弟分散」以致「閏餘乖次，孟陬殄滅，攝提無紀，歷數失序」（史記歷書）像那樣的時代，傳說中的「五月」，究竟是什麼月就很難定了。倘不能定為五月，則某月降霜之事，本是可能之二。再次，我們檢查漢書五行志，即有周考王六年六月，秦地降霜；周烈王四年四月，晉地下着大雪。這記載，豈不和鄒衍的傳說一樣？然則五月降霜之事，又是可能者三。如果這傳說是出自方士或鄒子之徒，我們懷疑那裡面或還帶有陰陽五行的用意在。因為依他們的推算是爲着：「十一月失政」故「五月下霜霜。」（淮南子時則訓）；或則「水干土」則「夏寒雨霜」（春秋繁露第六十二）的緣故。如果我們這點推測不算過份，我們更疑燕惠王在十一月間，不據罪證而拘捕了鄒衍，因此「當夏五月，天爲隕霜」（論衡感虛篇）。

我們持此看法的基本理由是：諸書所載的都是明言鄒衍在燕昭王時到燕；至于燕惠王曾否像他父親一樣招納賢者而鄒衍因而赴燕，則爲諸書所不載，因此我們推定鄒衍確是燕昭王即位之後到燕，一直住到燕惠王手裡，才被繫獄；或者即死于獄中。這兩項假定，我們可得數證以佐成結論。

第一，以樂毅的遭遇爲證。樂毅和鄒衍一樣是個外國人而充任燕昭王的客卿，他替燕昭王合五國之師，下齊七十餘城；之後，「燕昭王死，子立爲燕惠王。惠王自爲太子時，嘗不快於樂毅，及即位，田單乃縱反間于燕。惠王固已疑樂毅，得齊反間，乃召樂毅。樂毅畏誅，遂西降趙。」（節錄史記樂毅傳）。以樂毅的功勳，在燕惠王手裡，尚且如此，我們相信，他當時若不及早溜之大吉，豈不和鄒衍一樣「無罪而見拘于燕」（論衡引傳書的文句）再據樂毅報燕惠王書云：『臣不佞，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；恐傷先王之明，有害足下之義，故遁逃走趙。』末又曰：『恐侍御者之親，左右之說，不察疏遠之行，故敢獻書以聞。』（並見史記樂毅傳及戰國燕策）。看這些話，可知樂毅何等害怕燕惠王「左右」的人？我們認爲這些「左右」的人就是傳說中鄒衍繫獄由於「左右譖之王」的左右。有此「左右」，鄒衍走着樂毅同樣的命運乃屬當然；所不同的：樂毅在國外可以溜之，鄒衍在國內就只好「仰天而泣」了。

第二，證以燕齊當日之事。蘇代與燕昭王書，早已說過「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」（史記蘇秦傳附）。樂毅趙人（中山併入于趙）鄒衍齊人。當燕昭王立志伐齊的時候，有如公孫龍所說的「諸天下之士，其欲破齊者，大王盡養之」（見前引）所

以趙齊之人，亦得在燕國居于卿師之位。然而據酈道元後來聽到而且親見過燕昭王養士的遺跡，乃知燕昭王對那些諸侯之客本即懷有戒心。

水經註卷十一：小金台北有蘭馬台。長廊短廡，周旋被浦，棟堵咸淪，礎柱尙存。訪諸耆舊，咸言昭王禮賓，廣延方士，至如郭隗樂毅之徒，鄒衍劇辛之儔，自遠而屈者多矣。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，故脩連下都，館之南垂。察其古跡，似符夙傳矣。

這雖是很久以後的燕地耆舊之言，但稽以戰國燕策二，記有燕昭王將與天下伐齊，特召集「齊人之仕於燕者」說話，亦可信酈氏所記之非誣。在燕昭王自己即心存畛域之見，到了他兒子，更受着左右之譖以及田單反間之說，即使他做太子時對諸侯之客本無不快，也會走極端。更何況樂毅果然背叛而去，田單又一氣收復了七十餘城，而鄒衍齊人，其身份本已可疑，更加以他所持「水德」之說不特不靈，且還有「將徙于土」之勢，則其吃上官司，亦屬必然的了。

第三，證以左右之譖。我們認爲鄒衍之術是「養政于天文」（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語），不但他的顯名會受到一般人的羨妒，尤其是他的法術與龜策業者相衝突。戰國時代的諸侯王是否仍如春秋時代一樣相信蓍龜，而謂「玉前巫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」、「龜爲前列」（禮記禮運，禮器）；但我們有點證據可以說明陰陽家利用自然現象來預言的方法，與龜卜者僅靠著草龜殼來預言的，更有顯明的事象而爲戰國時人所樂從。這點操術上的優勝引起衝突，管子書中仍有所記載。

管子卷十四五行：故通乎陽氣，所以事天也；經緯日月用之於民。通乎陰氣，所以事地也，經緯星曆，以視其離。通若道，然後有行。然則神筮不靈，神龜不卜。黃帝釋「參」，治之至也。

「管子」爲書，是雜輯戰國諸子之文，今人羅根澤（管子探原）說四時五行等篇是陰陽家的著作；我們讀過這些文章，不但覺得陰陽家在演論陰陽五行，同時也在排擠卜筮。陰陽與卜筮的理論，後來雖已雜糅爲一，使得五行配上八卦而八卦又難以陰陽。但漢志已嚴別其種類，而專門家如張衡，更知「其所因者非一術」。

後漢書五十九：張衡上疏曰：臣聞聖人明審律歷，以定吉凶；重之以下筮，雜之以九宮；經天驗道，本盡於此。或觀星

辰逆順，寒燠所由；或察龜策之占，巫覡之言；其所因者，非一術也。

鄒衍在燕，曾否得罪龜策巫覡，雖莫之詳；然而朝廷決策，候星望氣者說「可」，而鑿龜數策數策者說「不可」，（例如史記日者傳後褚先生所記漢武帝聚會占家「問娶婦」之事），則事有必至。何況鄒衍所操的是沒有把握必驗的法術，即使受寵于先君，亦未必偶合于新主；遇到讒言，縱使不受顯誅，像漢世的眭孟京房；亦當遭「飛劍之窮」，如韓非所說的一樣。

第四，證以蘇秦身後情形，我們認爲鄒衍不特在燕惠王手裡被捕，而且即死于是時。司馬遷在蘇秦列傳極述燕國人厚待蘇秦，後來又向他討債。

史記卷六十九：齊宣王因燕喪伐燕，取十城。燕易王謂蘇秦曰：「往日先生至燕，而先王資先生見趙，遂約六國從。今齊先伐趙，次至燕；以先生之故，爲天下笑；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？」蘇秦大慄曰：「請爲王取之。」

蘇秦也就爲着償還這點招待的債而終至以身殉其權術。我們以爲燕易王的話可以移于燕惠王之口，當田單復國而燕師大敗之時，燕惠王亦好向鄒衍討債，但鄒衍不是縱橫家就只好坐在獄中仰天而泣了。

這裡，尤其可怪的：就是既已顯名于諸侯的鄒衍，何故忽然銷聲匿跡，其生平除司馬遷略述其一二之外，絕不爲戰國末諸傳說所提及，而且他那學說也被燕齊方士以及鄒子之徒改頭換面，變成種種形態而流傳。關於這點疑問，我們正好借蘇秦身後的情形，做個解答。司馬遷在蘇秦傳後說：「蘇秦兄弟三人，皆游說諸侯以顯名，其術長於權變。而蘇秦被反間以死，天下共笑之，諱學其術。」照一般說來，蘇秦以權術顯名而竟死于反間，其事確甚可笑。但所謂「諱學其術」云者，並非世人卽以蘇秦爲警戒而再不從事于權術；只是一面既從事于權術一面却避免沾上蘇秦的名字而已。據漢志所列縱橫家的作者雖不太多，但蘇秦之後尚有闕子國筮子以及漢之蒯通鄒陽主父偃等等，縱橫說之流行不絕，恰似鄒衍之後有鄒奭，鄒奭之後有公欝生，自餘呂丘子、杜文公、南公、容成子，韓諸公子以及漢之張良公孫淮邪等等（並見漢書藝文志），亦正流行不絕；且由它衍生爲兵陰陽，易陰陽，五行陰陽；而泛濫及于學官的經書，江湖的方伎還不計算在內。大可說是：鄒衍之死，其名愈晦而其學愈昌。我們想要解釋這種矛盾現象，除非爲着當時人「諱學其術」之外，幾乎無法理解。然而，當時人對於顯赫

的鄒衍何至于「諱學其術」？這又顯然因他的結局曾爲「天下共笑之」故。司馬遷說戰國時代「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」（歷書），他能據陰陽五行推算出天運和帝命，却算不出自己的命運當終，豈不和蘇秦的結局一樣可笑？因可笑而諱學其術，因諱學其術，乃至於使他的名亡而實存。

最後，我們依據讀過鄒子全書的司馬遷的評語，知道鄒衍約有三種學問，第一是儒者的仁義與墨者的節儉，因爲這是當時的「顯學」，也可能是他思想的根柢。第二是天文歷算之學，這是他深觀陰陽消息得來的純粹知識，可謂獨步一時的學問。第三便是他「聞見雜博」（荀子非十二子篇對五行家的評語）的知識，這部份大概就是大受一夥不通的燕齊海上方士歡迎的東西。拘小數，造禁忌，描神畫鬼，衍成齊諧志怪之續，而流傳及於後世，乃有新垣平，蠻大等一流人物；結果是斬了首。此外，把第三部份合于第二部份，硬使純粹的學理搭配現實的事象而冒充「先知」，這學問流傳及於後世，乃有眭孟京房等一流人物，結果也斬了首。另外，兼取第二第三，但更注重其第一部份，將儒者的仁義添上自然律的根據，合「天」「人」之事爲一體，而從中發揮其相呼吸變應的道理，這樣流及後世，乃有董仲舒劉向等一流人物，但他們也都因此吃過官司，差點沒送掉性命。鄒衍恰就是這些人物的宗師，我們認爲他縱得僥倖如董仲舒劉向，但至燕惠王時，亦已屆古稀之年了；在那風燭殘年，目睹故舊凋零，而又隻身拘囚于異國，僅僅促使他「仰天而泣」的心情，就已够逼死這個「老科學家」，更無須誣以罪過而誅以公法了。

據史記六國年表，燕惠王之元年正當齊襄王六年，其時燕國慘敗而齊國慘勝，鄒衍繫獄之年，宜繫于此。然則，司馬遷說鄒衍死于齊襄王時，豈不與此若合符節？如果他死時已年屆七十，從此上推，則其生年當在齊威王之世。兩漢時人，皆把鄒衍排列在齊威宣時代，可說是他們時代相近，說事尚無大誤；倘謂其生平不及見燕昭遺論威宣，則似乎武斷了。

此外，我們很同意司馬遷在孟荀列傳引述的「或曰」，說鄒衍生平言論有點「牛鼎」之意。故其游說時君世主「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」之談。不過他的弊病就出在這種「先合」上面，要求先合，便難免因阿諛苟合，循人主的嗜慾而拋棄真理。假使他能像孟子晚年，退隱衡門，收朋勸誨，專從他的第二部份，先驗小物而深研之，我們相信我國的自然科學，或早已萌芽

。不幸他生于亂世，又急于「頽頽以取世資」（楊雄解嘲文中評語），終至身死名滅，不特無益于仁義節儉之推行，甚至關於天文曆算音律等純粹的學問也隨而俱去，祇剩下「諱學其術」者之謠言與「不通」的方士之曲說，一變而爲讖緯之書，再變而爲道士經典；喜歡講道理的宋世士大夫，又借以演述天人之秘；論成績，誠不如江湖郎中僅靠他們「驗小物」的實際心得，傳下一些驗方之有益于人。